



论草根戏曲艺术的超越之途

——析贵州花灯剧《枫染秋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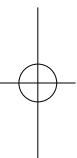
罗新民

今天，古老的戏曲艺术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纵观新时期中国戏曲发展的趋势，如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尚且难逃低谷，似花灯戏这样的地方剧种处境之尴尬更不言而喻。如何才能将继承与创新和谐统一？如何才能提升地方剧种的艺术生命力？这是戏曲艺术亟需应对的两大难题。该剧的上演赢得了专家的盛赞和观众的肯定，其成功创演对现代戏创作尤其是地方戏的创作提供了宝贵启示。

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转型，人们观念的开放、视野的开拓和创作环境的日益宽松使戏曲创作开始重视艺术规律，开始注重人物、人情、人性的刻画。《枫染秋渡》（以下简称《枫》剧）就是一出超越表象、沉入生命之维，深入灵魂、叩问心灵，切入文化深层，展示人物人格的魅力，追求审美价值的新剧。该剧塑造了3个主要人物：枫林酒窖的女主人刘荷荷、男主人林玉儒；裕丰酒窖新来的调酒师月妹。纵观全剧，它并没有道德主义的说教，也没有是非黑白的定论，在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剧中每一个人都闪耀着独特的人性之光。可以说，全剧善于在戏中刻画人物内心矛盾，极力彰显人性的“真善美”。女主人公刘荷荷是一位典型的封建社会大家闺秀，她与林玉儒的结合无关感情，基点是在门当户对上。然而林玉儒和丫鬟梅香那一段不容于世的恋情使她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

这一切，她屈而不辱，怨而不恨，善良的本性战胜妒意，在为梅香向老夫人求情未果后，她乔装打扮，资助梅香远逃，却想不到这一片善心换来的是丈夫十几年的误会和怨怼。月妹的出现对刘荷荷而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从送走梅香那一刻起她就知道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作为三个人之中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刘荷荷陷入了两难之境。一方面是月妹寻恩意坚，林玉儒认女情切；另一方面是一旦他父女二人相认，又置自己于何地？在反反复复的犹豫和挣扎后，她成全了父女二人的相认，也完成了人性的自我升华。刘荷荷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的坚韧、隐忍、退让和宽恕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妇女必须恪守的道德戒律，从这一层面上而言，这些传统美德也许都是“被动的”，但其人性真正的闪光点在于她先是敢于违背封建家长（老夫人）的意愿，救助情敌梅香；后又撇开心结引领丈夫和月妹父女相认，这份善良不是封建礼教赋予的，而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观众在刘荷荷身上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束缚在妇女身上的道德纲常，而是更深层次的人生况味。

再来看林玉儒，这个人物有其独特的矛盾性。他生长于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却怀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虽被迫接受了包办婚姻，但却依然不顾一切与丫鬟梅香相恋。东窗事发后，老夫人将梅香驱逐，不明就里的他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妻子刘荷荷





身上，并把“冷漠”当作武器，造成了两人婚姻的名存实亡。林、梅、刘三人的关系本无善恶之分，没有婚姻的爱情和没有爱情的婚姻同样都是身不由己。然而，在失去梅香后，林玉儒，这个曾向封建礼教竭力抗衡的男人却不自觉地行使了封建男权，在精神、生理上对妻子“实施”了十几年的冷暴力，这也体现出其人性的矛盾之处。

与男女主角相比，月妹这个人物则简单得多，出场时便已是裕丰酒窖的调酒师，年轻貌美、技艺高超，深受老板的器重和大家的喜爱。虽然她身世坎坷、颠沛流离，但母亲无微不至的爱赋予了她乐观、积极和善良的性格。母亲过世后她只身来到枫林渡为的是圆一个寻根和寻恩之梦。月妹的出现打破了刘荷荷平静却乏味

的生活，促使她在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后用豁达和宽容赢得了丈夫的理解和忏悔，最终拨开了婚姻生活的阴霾。可以说月妹就像是一轮明月照亮了枫林渡，她是“真、善、美”的形象化身。

《枫》剧正在于它摒弃了符号化的图解，紧紧把握人情人性，真正切入了人物命运的深层内核，特别是塑造了“刘荷荷”这个典型化形象，用女性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发挥出的超常能量，表现其极强的韧性，展示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而使整出戏充满了人情美和人性美。

可以说，该剧从人性与心灵层面拓展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维度和深度，打破了扁平人物的藩篱，使花灯剧的草根形态得到了百炼成钢的转化，艺术性、典型化得到了丰富和提升。



花灯剧《枫染秋渡》演出单位：贵州省花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剧情简介

20世纪初叶，黔北枫林渡口，林、刘两个酿酒世家联姻了。婚后丈夫林玉儒与丫环梅香有染并生下一女，林家老太太动用家法、撵走梅香。妻子刘荷荷在痛苦伤心之余，选择了包容，她去渡口替梅香母女找船，并赠予这对母女路上的盘缠。为了不让丈夫憎恨婆婆，她默默忍受着丈夫认为是她赶走梅香母女的责怪……十八年后的一天，林、梅生下的女儿出现在林家，她说出了梅香母女被赶走的真相，为刘荷荷洗雪了冤屈，化解了一家人心中的寒冰。